

# 从打工妹到失足女： 新生代打工妹失足的原因探究<sup>①</sup>

周俊山 尹 银

**摘要：**打工妹失足的原因需要整个社会关注。通过深度访谈发现，打工妹进城都有提高收入和城市融入的目标，但是受城乡二元社会、性别歧视和企业高强度劳动的影响，一些缺乏人力资本和吃苦耐劳精神的打工妹的目标显得不合实际，她们会逃离工厂成为服务员，但仍旧没有得到上升的正常制度化空间，她们只好成为包房公主，也逐渐失去了乡土社会网络的支持和监督，在城市社会网络的催化下，加上社会不良思想和家庭的影响，一部分沦为失足女。本文主张增强打工妹在城市的制度支持，塑造正气和正确的价值观。

**关键词：**新生代打工妹 失足女 原因 文化目标 制度化手段

##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尽管性服务在中国大陆属于违法行为，但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重新蔓延，甚至在一些地区地下经营已经达到产业化规模(潘绥铭,1999)，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据估计，全国失足女的总量超过 1000 万人，其中进城务工的农村女性是主体(李娟,2011)。目前在农民工外出打工的 1.5 亿人中，80 后、90 后“新生代农民工”占 60%(新生代农民工基本情况研究课题组,2011)，他们往往出生以后在农村上学，上学之后就进城打工甚至有些一直在城市上学和长大，相对来讲，对农业、农村、土地、农民等不太熟悉，渴望进入、融入城市社会，而城市在很多方面还没有完全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产生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农村外出人数上，女性总体上比男性少，但是未婚女性的绝对人数和比例都大于未婚男性(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2004)。未婚女性进入城市，脱离了家庭的保护和帮助，面临着陌生的城市环境，她们很可能失足，是一个需要整个国家和社会去深思和关注的群体，尤其是她们的失足原因应该受到关注。

研究者试图确定女性失足的原因，已经证实了失足和以下因素的关系：童年经历(Brunschot & Brannigan,2002; Bullough & Bullough,1996)，家庭背景(Dalla,2006; Sharpe,1998)，贫穷(Bamgbose,2002; Brunovskis & Tyldum,2004; 陈红霞,2003)，吸毒(Dalla,2006; Potterate et al,1998)，社会因素(Bamgbose,2002; Brunovskis & Tyldum,2004; Dalla,2001; 单光鼐,1995; 黄盈盈、潘绥铭,2003; 张晓红,2007)和观念(Bamgbose,2002; 王金玲,1994; 陈红霞,2003)。然而，实证研究的结果对于上述失足原因及之间的关系未能提供一致的证据(Brunschot & Brannigan,2002; Dalla,2006)。贫穷经常被作为失足的原因(Delacoste & Alexander,1998)，许多女性认为因为失业、收入过低或备感绝望的经济情况她们“被迫”失足(Franceschini,2008)；然而研究发现，并不是所有的女性失足是因为贫困(Brunovskis & Tyldum,2004)，在许多情况下，贫穷是相对的(Brunovskis & Tyldum,2004; Sharpe,1998)，失足女可能贫穷、缺乏教育，但是很多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为了追求高收入(Evans,1997)、进入上流社会或享受奢华生活而失足(苗翠环、李龙海,2008)，关键的问题不是有没有工作，而是收入低，因此失足成了一个理性选择，能够不劳而获(Sharpe,1998)。杰森(Jesson,1993)建议要注意失足的直接环境和情境因素，如周围有很多卖淫场所和性的需求。而还有实证研究显示，家庭背景

<sup>①</sup> 本文系 2011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青年项目(项目批准号:11YJCZH257)和 2012 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项目批准号:12CSH098)阶段性成果。

和早期生活经历不能明确为什么一些女性失足(Sharpe, 1998), 尽管一些研究表明家庭成员和朋友在女性失足过程扮演了重要角色(Brunovskis & Tyldum, 2004; Sharpe, 1998; 张晓红, 2007)。刘(Liu, 2012)对中国的研究表明, 童年经历和贫穷并不是女性失足的原因, 情境因素(朋友或亲戚的影响、普遍的性场所和广告)是不可或缺的因素, 还包括欺骗或者强迫卖淫。这些因素可能是结构性的, 包括贫困、不平等、失业、宗法文化、个体生活事件和亲戚朋友等方面的影响。因此失足是“一个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结果, 个人理性选择和已经失足女性朋友或亲戚的影响、经济状况、家庭和个人的共同影响, 当众多的外部压力进一步加剧, 能够有助于解释失足, 使其看起来是一个非常合理的、合乎逻辑的和可行的选择”(Sharpe, 1998)。但是从总体上来看, 在以往研究中, 研究对象被抽象化、统一化、刻板化, 对于中国农村流动妇女研究着眼较少, 尤其是新生代打工妹, 还有些调查是在羁押的失足女中进行(张晓红, 2007; 陈红霞, 2003), 脱离了调查研究的原始自然背景; 缺乏运用分层社会学视角进行的研究(黄盈盈、潘绥铭, 2003), 缺乏失足女与正常女性的对比研究, 对失足的过程的对比和分析着眼不足, 忽视了其中的筛选机制。

本研究接受黄盈盈、潘绥铭(2003)的观点, 将失足女作为就业妇女的一部分, 把研究对象集中于新生代打工妹以及她们中的失足女, 尝试将失足女放到农民工进城就业的大背景中去, 从社会融入的视角出发, 基于越轨行为理论和生命历程理论, 将失足女与打工妹对比, 分析她们就业的历程、分化及原因, 寻找失足女与打工妹群体之间的差异性, 进而研究失足女怎样进入性服务业, 是什么原因或者存在什么筛选机制促成了她们身份的转变, 为什么面临同样的社会环境而选择不同, 个人和社会各应承担什么责任。通过对比分析, 最终探讨政府与社会该如何“作为”。

## 二、研究设计

笔者于2012年3-8月在深圳市进行了近半年的深度访谈, 之所以选择深圳, 是因为这里是改革开放的窗口和农民工的发源地。在深圳, 外来女性主要受雇于工厂, 另外通常还在以下两个领域谋生: 一是服务业, 诸如服务员、家政服务以及小商贩等; 二是从事色情服务等边缘职业, 基本形成层次分明的两大人群: 第一种服务人员, 娱乐场所负责按摩、修脚等一些有技术含量的工作, 还包括包房服务员(称为“包房公主”), 与失足女(俗称“小姐”)不一样, 原则上不陪酒, 主要任务和饭店包厢里的服务员一样, 负责帮客人点歌、点餐、倒酒、调酒、房间清洁等, 为了与普通服务员区别, 我们统称为“包房公主”; 另一种失足女, 也分为两类: 一类是年龄相对年轻, 主要在洗浴中心、夜总会、KTV等场所接客且收费偏高, 就是陪客人喝酒、唱歌、聊天或跳舞, 也分坐台和出台; 另一类是所谓的“街头妹”, 大都年龄较大, 主要在小旅社(宾馆)、小招待所甚至自己租房接客, 收费较低。本文主要是关注未婚女性, 研究对象是前一类失足女。

我们采用深度访谈方法, 为了拓展访谈对象的代表性, 涵盖不同人口学特征和社会经济背景的打工妹和失足女, 在选择访谈对象时使用目的抽样进行筛选。我们界定的“新生代打工妹”, 主要指从农村到城市打工, 而非自己投资当老板的年轻未婚女子, 通常是在1980年后出生, 且至少出来打工3年以上; 我们用两个标准来判断失足女: 在专门提供性服务的场所工作, 有性交易行为。对于失足女, 严格来说也是打工妹的一员, 但为了区别起见, 称她们为“失足女”, 而将失足女以外的统称为“打工妹”。为了保证访谈的真实性, 我们没有访问在羁押的, 而是暗访夜总会、KTV等娱乐休闲场所工作的“包房公主”和小姐。首先, 我们根据以前的扫黄打非资料, 落实具体调查点。基于访谈对象的“非法”与“地下”的特性, 比较成功的访谈方式是: 第一次6-7个人以唱歌或按摩服务认识娱乐休闲场所管理人员(妈咪)、小姐和包房公主, 通过非正规聊天, 将话题引入调研主题, 同时辅助观察, 逐渐获取所需材料, 并获得她们的联系方式, 为下一次访谈做准备, 以后进入服务场所点名要这名访谈对象或者将访谈对象约出。对于打工妹的访谈比较简单, 我们直接与工厂联系, 按照结构化访谈提纲进行访谈, 在得到允许的情况下, 进行了录音。访谈内容主要涉及五个方面: (1) 个人基本情况, 包括年龄、文化程度、辍学原因、家乡所在地等; (2) 家庭状况, 包括父母的人口学特征、兄弟

姐妹状况、与父母感情及交流状况、家庭经济状况等；(3)目前工作基本情况,包括工作时间及强度、收入、就业途径、社会保障状况等；(4)工作经历,从她们第一份工作开始。包括进城打工原因、工作种类、性质、就业途径、工作时间长度及强度、工资情况以及辞职原因等；(5)个人生活状况,包括消费、恋爱、个人社会网络及未来规划等。我们访谈了24名女孩,其中6名是工厂中的打工妹(厂妹),6名是服务员(其中2名大商场服务员,1名个体户卖场服务员,3名餐馆服务员),6名“包房公主”,6名失足女,2名企业管理人员,2名妈咪,2名警察。每名被访者的访谈次数在1-3次,每次访谈时间1-5个小时不等。

### 三、被访女孩的工作历程

我们发现,24个被访女孩有很大的共同点:来自农村,大都是初中文化水平或初中肄业,最高的是职业中专,很早出来打工,最小的是15岁;最初一份工作都是进工厂,但是中间分化了,有一部分进入了服务业,成为服务员,而后是包房公主,之后沦为失足女。我们可以发现,厂妹的工作经历比较简单,就是在工厂打工,只是可能换了工厂而已,失足女的情况则比较复杂,在不同阶段中,失足女做了很多尝试,她们逐渐堕落、颓废,走了几乎相同的工作轨迹:工厂——服务业(主要是商业)——娱乐休闲场所——失足,身份也由厂妹(C)——服务员(F)——包房公主(B)——失足女(S)转变(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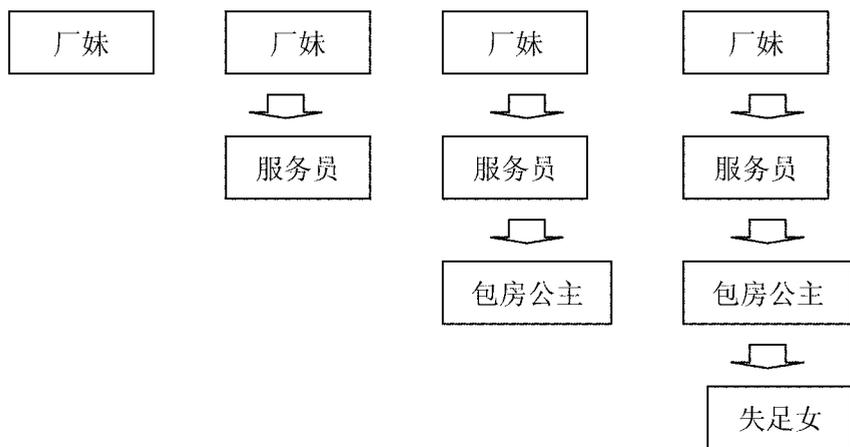


图1 被访女孩的类型及工作历程

“自由、压力小、赚钱多”往往是失足女解释她们失足的原因。她们作为新生代农民工,成长轨迹并不像父辈那样,她们带着对城市生活的憧憬进城打工,但发现打工并非她们想象的美好,一部分女孩很快厌倦长时间的工厂工作,主动或者被动地离开工厂,退出了厂妹这个角色,进入服务业,成为服务员。服务业一般都处于城市繁华地带,从城市边缘的厂区到了繁华的商业区,扩展了成为服务员的这些女孩的眼界,天天打交道的顾客的“言传身教”展示着她们原本憧憬的城市生活,进一步催化了她们的城市梦想(何明洁,2008),但是现实中靠她们辛苦打工挣的钱只能满足基本生活需要,使她们心理失衡,“有钱人太多了,一件1000多块钱的衣服,一下子就买下来,……顶(相当于)我(当时)一个月工资了。(B1)”更加明确地感觉到与城市居民巨大的收入和地位差距,一种潜在的“相对剥夺感”产生。她们会一次又一次通过换工作尝试新的途径试图改变这种状况,而在短时间内找到的收入较高的工作就是城市中数量庞大的娱乐休闲场所,也就是说,城市的整体环境和需求为她们提供了成为失足女的土壤,而相关的社会保障机制又没有有效地提供支持以阻止她们进入。她们主动或被动地尝试这种工作,成为包房公主,但却没有意识到这次就业是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张晓红,2007),在服务娱乐业工作是女性农民工失足的关键因素之一(王华,2012)。

相比于女性从事的其他职业,失足女惟一的区别是“性”。从性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皮肤是“性”的终端感受器,女性只要从事与男性有皮肤接触的工作就已经“涉性”了,因此涉性是从做服务员时就开始了(黄盈盈、潘绥铭,2003)。失足女的工作历程告诉我们,她们每换一次工作,涉性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究竟什么原因使她们选择不同的道路?按照默顿的文化失范理论(Anomie Theory)(特纳,2006),越轨行为是社会制度化手段和文化目标之间发生冲突的结果。社会文化为社会成员提供了奋斗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正常制度化手段,但却不可能为每一个社会成员提供去实现目标的正常制度化手段。根据文化目标与制度化手段之间的关系,个人有五种适应途径:(1)遵从,指认同社会文化目标,遵循制度化手段;(2)创新,指认同文化目标,但不遵循制度化手段,而用创新方式去获得文化目标;(3)形式主义,指行为目的不在于获得文化目标,而只是遵循制度化手段;(4)退隐主义,指对文化目标和制度化手段都不认同;(5)反抗,指希望创立新的文化目标和制度化手段来取代现有的目标和手段(见表1)。

表 1 行为类型的文化目标与制度化手段

行为类型	文化目标	制度化手段
I 遵从	+	+
II 创新	+	-
III 形式主义	-	+
IV 退隐主义	-	-
V 反抗	±	±

而越轨是文化目标与制度化手段之间矛盾的产物。在上述五种适应模式中,除第一种模式外,其余四种都是程度不同的社会越轨。本研究基于失范理论,比较打工妹与失足女的文化目标和手段,挖潜她们文化目标和手段选择差异的原因,探讨应对策略。

## 四、打工妹与失足女文化目标与制度化手段的比较

打工妹与失足女文化目标的差异以及正常制度化手段的掌握不同,造成了她们选择越轨的方法实现自己的目标。

### (一)打工妹与失足女目标的比较

相对于老一代农民工,进城打工是新生代农民工生命历程的必经之路,其意义由“谋生”逐步转向“立业”,最终目标是融入城市,实现农民身份的转变(朱虹,2008);在这四类女孩的目标中,尽管有相同的地方,但是差异也比较明显,而正是这种目标的不同,使她们选择了不同的道路。

#### 1. 目标都是提高收入,但是失足女的目标往往不切实际

受访对象选择在比较中更加明显。虽然打工的主要目的之一都是提高收入,厂妹的目的还是较为接近现实,一步步地靠自己的劳动,而其他女孩的目标则显得不切实际的多,她们希望很快地提高收入。服务员 F1 找到了 1 个男友,办个小公司,但是她嫌男朋友赚钱慢——“他(前男友)和朋友合作开一家装潢打印店,但是半年多都没有赚到钱,我着急啊,他却不着急,我们争吵越来越多,再加上一些朋友劝我,后来就分了”。虽然失足原因众说纷纭,但是有一个共同的原因——金钱(Liu,2012)。在我们调查中发现,富士康集团有一个规定,每个月向工人工牌里打入 300 元钱餐费,据受访对象介绍,如果不加班的话,按照厂里消费水平,可以支撑 1 个月,但是工厂以前是直接餐费打进银行卡了,结果很多工人消费无计划,导致到后半个月无钱可花了。钱不够花,只有另谋出路。甚至还有 1 个失足女(S1)之前有固定的工作,是幼儿园老师,但是“钱少,1 个月才 2000 元,我出来想好好赚点儿钱,明年就回去上班”。而厂妹面对“工资低为何不从事特殊行业的”提问时,对失足女的选择难以理解,大部分的回答是“有些钱是赚不得的”,“赚那些钱,我爸知道还不把

我打死”，“也有1个朋友做小姐，而每次见面，她的衣服一件比一件漂亮，下的馆子也越来越高档，看到她的变化，说无所谓是假的，但我没法接受那样的工作”。

追求好的生活是每个人的权利和向往，但是多数女性由于资格或技能不足，她们中的许多人确实不能获得安全稳定的工作(Sharpe, 1998)，在工厂做个普工，上班、付房租、吃饭，收入肯定低于卖淫。据失足女介绍，夜场KTV1个顾客400元1晚上，被妈咪抽走100元，小费每人一晚上是300元，1个月至少保底1万不是问题，如果加上出台，收入会更高。

## 2. 对爱情、婚姻的奢求

除了为实现一份收入较高的稳定工作而努力外，一些打工妹试图通过与城市男性结婚取得城市身份(朱虹, 2008)。

访谈中，不少受访女孩都表示“要找个城里人”。从事服务业女孩的愿望更加强烈。“我现在降低标准了，只要有稳定工作的城里人，哪怕年龄大些也行”(F1)。服务业大都设在城市中心地带，相对于厂妹，这些女孩们在地理空间上更靠近城市，没有严格的工厂制度，接触面广，提高了她们眼界和见识，择偶的条件也较高，想嫁到城市，尤其是与有固定工作甚至体制内的人结婚：“太累了，我想找个人嫁了，我一个朋友找一个男的，大她9岁，是吃国家饭的，特幸福。……9岁不算大，不超过10岁就可以(B3)。”但是在城市的婚姻市场中，打工妹几乎没有任何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尤其是身体资本就显得至关重要，事实上，后者有时还可能是唯一的资本(朱虹, 2008)，城乡身份差异、受教育程度的不同，加上女性自身的生理和心理弱点，她们很难得到幸福的爱情和婚姻，最终逃不脱被玩弄和抛弃的命运(Pun, 2005)。妈咪B说：“我们这也有因为爱情受过伤害的，我记忆最深的一个，十几岁找了一个对象，生了1个女孩，结果那男的有老婆，不让进家，没办法她就嫁人了，嫁的老公肯定不好，就这样过了一两年，后来那男的又去找她去了，说离婚了，让她回去过日子，结果女的抱着孩子去了，到了男方家发现上当，人家就是想把女儿要回去，又把她赶走了，……什么都看透了。”最终这些女孩发现通过婚姻这条路改变自己的命运也走不通，时间久了，她们对自己的工作又厌倦了，加之工资也不高，很容易自暴自弃。一个失足女(S2)说：“从工厂出来，首先是帮人卖衣服，一天站十几个小时，往往还卖不出几件，所以辞职进了一家KTV做包房公主”。而一旦进入这个行业，她们也知道，婚姻基本上是破灭了，刚失足的S3说：“我没有找男朋友，男人说不在乎，其实心里都很在乎的。姐妹中运气好的找个老实的帅哥当神一样供着，运气不好的找个混社会的人，只能当作是个靠山和受气后可以替自己出头的保镖。没有正儿八经的人会爱上我们的。”因为身处社会底层以及本身的职业和污名化，她们的男友多数是社会无业青年，甚至吸毒、偷盗、抢劫，这是她们“患难与共”的伙伴，她们很容易滑入更深的深渊。

厂妹的工作地点往往远离城市，严格的管理制度导致“平时工作很累，下班后什么都不想做，哪有时间 and 心思去谈恋爱？”当然伤害也少很多。最重要的是，厂妹对婚姻抱有比较传统并清醒的认识，可能受父母或工厂就业环境影响，她们更可能趋向于回乡结婚：“家里还没有见过他，就是和我妈说过，我妈嫌他年龄大，他比我大3岁，和我哥一样大(C6)”；“我妈说城里人不可靠，我爸妈要求我对象一定是我们省(份)的(C2)。”

## (二) 正常制度化手段的缺失

提高收入和身份转变的制度化手段有多种，高教育程度、辛勤劳动等，对于这些制度化手段的控制不同导致受访对象出现分化，失足女大都早早辍学，而社会又没有提供合适的城市融入空间，使其走向失足的道路：

### 1. 很早辍学：社会、学校、家庭责任缺位及外界诱惑

文化程度显著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水平(胡宏伟等, 2012)。24个受访女孩大都早早离开学校，导致其缺乏人力资本，但是仅仅有一个是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其他的都是自己主动辍学。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口流动的增加，农村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改变，“厌学热”、“新‘读书无用论’”在农村很有市场，访谈对象原来大都是留守儿童，她们缺乏父母的关爱和引导，可

能导致身心发育不全,缺乏明辨是非的能力(Kandel & Kao, 2001),很容易沉溺于网络以及交友不慎,这成为导致辍学的极为重要的原因。虽然也有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儿时可能随父母到城市生活,但是由于教育和住房等制度性障碍,他们往往不被城市社会所接纳,只能辗转于城乡之间求学,这增加了他们接受教育的不稳定性。在多子女家庭中,女儿受到的负面影响更加严重(胡枫、李善同, 2009)。

近年来大学生就业难的现象,导致农民对教育失去希望,加之功利主义的加剧,致使很多父母和孩子放弃读书去打工,从打工带来的短期收益而得到补偿和心理安慰(周潇, 2011)。“考上大学有什么用,不是也打工吗?”“我们这还有大学生(做小姐)呢!”学校过于注重升学率,忽视对学生价值观的教育和引导。如今应试教育依旧占主流,对学生的评价标准依旧是学习成绩,成绩不理想的学生甚至受到歧视(谢泽源、谢梅林, 2004),导致他们逐渐对读书失去兴趣——“我学习太差,班主任说我拖后腿,不让我报名(参加中招考试)了。(S3)”“老师就盯着好学生,谁管我们啊!(C4)”缺乏关爱而形成的叛逆性格和低心理承受能力,她们在遇到困难时很容易辍学(张明水, 2011)。访谈中听的最多的就是“我不想学习,一进教室就头疼”。同辈群体对青少年的影响也不容忽视。这24个受访女孩大都是90后,从小父母大都在城市打工,加之电视、网络等媒体的发达,她们看到城市精彩的一面,辍学更多的是因为学校生活单调乏味,缺乏乐趣(周春艳, 2005)和对外面世界的向往,出去打工的同龄女孩,春节回家的消费给了她们极大的诱惑,而父母为了补偿对她们的欠缺,打工回来后给予的钱更加深了她们这种印象,“我初三上学期还努力学习,后来我同桌经常给我说打工多好多好,我就不想上学了,下学期我妈妈让我去上学,学费都给我了,我拿着出去打工了(C6)”。

## 2. 企业高强度劳动和农民工吃苦耐劳精神的缺乏

从短期看,辍学打工给家庭带来一定收入以及心理平衡,长期来看则是得不偿失。缺乏人力资本,她们只能进厂成为一线工人。当今工厂为了追求利润,采用看似先进的流水线管理,一味强调提高效率和质量,但是忽视了人本管理。管理不善、高强度工作、超长时间加班加点等,让人的承受能力超过了极限,很多年轻人望而却步(“两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调研组, 2010)。企业管理人员A说:“不管是谁从事制造业,时间长了都会感到厌倦。”新生代农民工都是80后、90后,自我意识强,更倾向于个人主义和自由化。老一代农民工大都是主动走出农村进入城市,有吃苦冒险精神,对进城后面临的困难有心理准备,但是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是被卷入打工大军的,他们并没有吃苦耐劳精神,抗压能力差。高强度劳动对身体本来弱于男性的女性影响更大,因此女性择业倾向的改变最为明显,导致越来越多的女孩逃离工厂(Enright et al., 2005)。“我们以前的男女比例,不敢说1:9,也有2:8吧。”受访的一位富士康集团管理者说,但是到2011年底,富士康低于30岁的员工中女性仅占36%。

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很多人并没有农业劳动经验,多是从学校直接进入工厂。由于身体状况和生活经历各异,每个人对劳动强度的体验不同,引发不同的职业选择。6名失足女都抱怨在工厂很累,甚至在市场卖衣服也说累,“一下子站十几个小时”。一个洗浴中心工作的服务员(B4)抱怨:“我们这也累啊!……比如这按头啊,时间长了手指会疼,甚至会变形。”她又接着说:“我们很多同事都是这样,累了就休息一阵子再回来。”但是对于工作累的评价,厂妹却有不同意见:“也不能说累,其实和农活比起来,算轻松的,我出来打工之前,一小袋子小麦(约80斤)都能扛动,但是现在不行了(C2)”。“不是太累,累了可以不上班,但是就是工作总是一个动作受不了,我曾经在一个制衣厂工作,一直用剪刀,结果手都变形了(C4)”。在对工作强度的评价中,出现了分歧,一部分抱怨工作太累的女孩经过了在不同工厂之间的流动以后,对工厂已经彻底厌倦和失望,也无法再适应农村的生活,而在城市社会中,上升的正常渠道极为有限,可能迫使她们误入歧途!

## 3. 城市上升的正常制度化空间被压缩

从流动方向来看,社会流动分为两种:一种是在地理、空间位置上的,称之为水平流动;另一种是所属社会阶层的垂流动。人的需求都是多方面的,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进城打工的目的不

仅是提高收入,还包括融入城市的垂流流动,但是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结构失衡,社会排斥无处不在,制度也不健全,农民工阶层凝固化,城市融入困难重重(孙秀娟,2007)。

农民工融入城市最重要的是经济融入,就是在城市工作和买房,其次是制度性因素,即获得城市户籍;最后才是社会融入,有城市配偶和朋友(李培林、田丰,2012)。但是每个层面的融入都有不少障碍,主要是制度障碍,严格的户籍制度依旧束缚着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比较而言,经济融入反而可能是最易达到的(李培林、田丰,2012),但是打工妹自身的低收入和城市的高房价使经济融入也不太可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经济增长很快,但农民工工资提高较慢,深圳市总工会的调查发现,2010年深圳市新生代农民工月收入只有1838.6元(王鸿利、翟玉娟,2010),低工资绝大部分原因是歧视,个人特征只占少部分(王美艳,2003),女性农民工承受双重歧视,工资低于男性,性别歧视是主因(李实、杨修娜,2010; Meng, 1998)。访谈中无论厂妹还是失足女都一直在抱怨她们“太廉价了”!而与低工资对应的是高房价,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字显示,2010年深圳全市新房成交价格每平米已突破2万元大关,这对于农民工来说就是天文数字,经济融入也不现实。更为关键的是,由于是流水线生产,工人们学不到太多的技术,这是访谈中无论打工妹还是失足女说的比较多的。访谈F2时,她悄悄指了指在饭店刷盘子的一位中年妇女说:“她就是我的明天,在城市打了十几年工,回家结婚生子,孩子大了再出来打工,只能做保洁了。”付出了青春,还是没有融入城市的可能,所以一些打工妹只能将城市融入的渠道寄托于婚姻上。

### (三)失足原因的探讨

这些女孩可能面临同样的问题,但为什么有一些女孩会沦为失足女呢?生命历程理论认为,个体具有主动性,人的社会选择受到社会情景、个人经历和个人性格等特征的影响。进城务工女孩的社会网络非常短缺且不断流失,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加上社会和家庭因素的影响,她们很可能把失足作为谋生手段(Yang & Xia, 2006)。

#### 1. 家庭因素

女性堕落大都能从家庭找到根源(王惠,2009)。打工妹与父母的感情还是较好的,与父母联系较多,通常在重大决定前较多倾听父母的意见。但是对失足女家庭背景的访谈总体上是失败的,无论我们采用什么方式询问,她们大都对父母婚姻、感情等避而不谈,我们只好侧面访谈。

失足女大都从小缺少父母关爱。他们的父母基本上都是农民工,由于长期在外打工,一年都回不了一次家,对子女的身心发育有负面影响(Amuedo - Dorantes & Pozo, 2006),“(失足女)大多出身农民工家庭,与家人之间缺乏沟通。……很多失足女被抓后,她们的父母才知道她们从事这个,甚至才知道女儿在深圳打工”(警官A)。打工父母为了弥补对孩子的内疚,有限的回家时间就是尽可能地用钱去满足孩子需要,没有正确引导孩子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在这种教养方式下,可能会使孩子形成各种不良的生活习惯和观念,她们在进城后,迅速地淹没在市场经济追逐利益的思想下,一旦堕落,父母就无力改变和帮助孩子了。受访的6名失足女都进城打工3年以上,除了1名刚刚进入失足行业外,其余的都失足1年以上,但是“这些年没有存下钱,也没有给过家里钱,买衣服、化妆、租房啊!不知不觉都花光了!(S5)”

在厂妹的打工过程中,父母的影响依旧存在,有一定见识的家长不会让女儿过早出去打工。C4是一名文员,中专文凭,她说:“我初中毕业那年就要出来打工,我妈妈不让,把我送到职业中专又读了3年书。”也许她妈妈这一决定影响了她的一生。父母的见识与建议影响着她们与父母的交流及工作选择,“我的手变形了,给我妈打电话说了,我妈立刻说咱不做了,一个月的押金也不要了(C4)”。同样面临女儿的辞职,S2的父母则说“辞职了这个月不是白做了吗?”尤其是重男轻女的思想在某些地区还是很严重,把女儿当作赚钱工具,这也是女孩失足的一个原因。妈咪A说:“这一行大部分是(赚钱)为了自己吧,我这么多年接触过的姐妹,也有为了家庭的,有个姐妹,还有个双胞胎妹妹,家穷又想生儿子,所以一生长下来就把她们送人了,16岁初中毕业父母又去要回来,她们很高兴的,结果父母是因为女儿能赚钱了,16岁就让打工赚钱,赚100要走150,女孩子身上几乎没

有零花钱,赚钱少天天被说,最后终于……。那倒是父母挺高兴,拿回来钱多了呀。”一些女性失足,有时是被迫在很短的时间内赚一大笔钱(Liu,2012),家庭中的突变也可能导致失足,“我就有两个姐姐,没有哥哥,我爸得病(癌症)了,我没有办法,我爸最疼我了。(S4)”

## 2. 社会网络

在失足前,失足女的社会网络就与厂妹的不一样了。社会网络对移民的社会融合具有重要作用,尤其在正式支持制度缺位的情况下,其作用更加重要(Zhao,2003)。这些女孩初次进入城市,与其他农民工一样,是由亲戚或老乡带入的,这些关系是她们初始阶段社会网络的全部,也是在城市中最初的支持体系(李培林,1996),我们称之为乡土社会网络,就业后,业缘关系就成为社会网络新的延伸点,最终形成新的城市社会关系网络,这种社会网络在她们就业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但是作用不同甚至相反。

由于工厂与城市社会相互隔离,厂妹与城市人和城市社会互动存在障碍,其社会网络多局限于乡土社会网络(朱虹,2004)。虽然这种乡土社会网络可能束缚了她们的城市化进程,但不可否认其依旧存在正向作用,能够增加相互支持,还包括监督作用。这些女孩中坚持厂妹角色的有几种:与乡土社会网络联系紧密或找到有上进心的男朋友,“我哥也在这个厂子里打工。(C2)”“我男朋友、哥哥、嫂子、姨都在这个工厂里,我有什么困难都找他们。(C1)”C4的妈妈的决定可能影响她的一生,3年的职业中专不仅使她获得了技术,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她更加成熟,更重要的就是获取了一个重要的社会网络。“我现在交往的主要是同学,我们是一个学校出来的,当时进厂也是一个厂。”而这些同学同时也是老乡。传统文化和农村舆论的压力凸显了乡土社会网络的重要性,厂妹都纷纷表示宁愿回乡种地也不会失足,笔者询问包房公主和失足女“你们家人知道你们做这个或在这儿工作吗?”她们一概回答“他们当然不知道(S2)”,“这事怎么能让他们知道(S5)”,“我现在和在(在深圳)老家的人都不联系了,他们知道我在这儿工作,怎么能行?(B6)”这也从反面突出了乡土社会网络的监督作用。

城市社会关系网络对失足妹角色变化过程起到催化作用。与厂妹相比,服务员拥有更多的城市社会关系网络(朱虹,2004)。城市社会关系网络固然有利于她们融入城市,但也带来了一定风险。她们意识不到城市社会关系网是弱关系,一旦发生意外,对她们的帮助不大甚至是负作用(徐丙奎,2007)。传统文化对服务业的歧视,使服务员有意识地将自己与乡土社会网络隔离,脱离了乡土社会网络的女孩面临着很多风险,女性农民工在就业过程中被骗甚至被拐卖等一些严重损害其合法权益的现象时有发生(许淑芬,2009)。“以前经常出现犯罪分子利用老乡身份拐骗打工妹的(警官B)。”从侧面也反映出乡土社会网络的重要性,因此服务员更容易滑入失足女行列。色情场所为了保护自己,很少通过正当渠道招聘员工,即使招聘也是打着招聘服务员的旗号,主要是通过老员工介绍,在从事色情服务等边缘职业的12名女孩中,仅有1名是通过正规渠道就业的,其余都是朋友介绍的,而这种朋友往往自己本身是包房公主或失足女。当女孩对服务员工作不满意或者亟需用钱时,往往出现一位前同事,她们从事性产业关系密切的工作或者本身就是失足女,更可能接触和获得性产业的相关信息(黄盈盈、潘绥铭,2003),在他们对色情场所的丰厚待遇渲染下,不少女孩会动心,虽然一开始她们发誓就做包房公主,但是一旦进入这种场所,就陷入了一个色情的亚文化社会网络,很难洁身自好了,“在这种声色场所,公主沦为小姐是很正常的事。(妈咪A)”同事之间存在收入的攀比现象,如果以前的“相对剥夺”是与城市人相比的话,而现在的相对剥夺则是与自己的姐妹相比,这种感觉更明显并更具有杀伤力。S5与朋友S6交往5年,在S6成为失足女后还继续交往,S6总是把S5带到一些高档场所吃饭应酬,还告诉她“玩玩有什么事情,还给钱,你和钱有仇啊?”S5慢慢从服务员到包房公主,最后也沦为失足女,现在还经常与S6互相介绍客户。妈咪的引诱也是失足的原因之一,色情场所的管理也是企业式管理,每个妈咪手下有一定数量的失足女,妈咪的收入依靠这些失足女的业绩,所以妈咪经常向那些包房公主灌输钱的重要性,“趁年轻赚几年钱,找个好人嫁了,后半辈子就有福了”,这是妈咪B在访谈中不断提起的一句话,在工作中,妈咪经常借口失足女不够,让“公主”顶班,有了第一次,包房公主就慢慢堕落了。客人的要求,“公

主”虽然原则上不陪酒,但有时客人要求喝点,也不能拒人千里之外,慢慢地她们会发现失足是最方便快捷、最轻松的赚钱途径(唐筱容,1999),而脱离了乡土社会网络,使她们易于并敢于失足,曾经发誓只做包房公主的S2“看到她们一晚上赚的钱超过我一个星期,在半推半就下就答应了出台”。

### 3. 社会环境

当前我国正处于转型社会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全球化的推进,国人开放进取、多元包容的社会心态日益浓厚;同时,不可忽视的是,在有些社会领域,原有规则被破坏掉,新的伦理和价值观又没有重建起来,处于失衡、无序的状态,这催生了功利价值观,道德底线失守(孙立平,2004),脚踏实地、吃苦耐劳的精神缺乏,非常突出地反映在有些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上。

如今思想引导与教育方向发生了一定程度上的偏差,媒体和社会经常渲染无需努力和辛勤劳动就能获得舒适生活,耳濡目染下,很难让一些不能自律的年轻人养成吃苦耐劳的意识和习惯,她们喜欢“小燕子”(电视剧《还珠格格》的主人公),因为“大长今(韩国电视剧《大长今》的主人公)要天天干活,小燕子就是玩”。大规模的城乡人口流动强化了市场经济在农村的力量,在利益机制的驱动下,农村社会各领域越来越受到市场规则的影响和支配,传统乡村价值观发生了深刻变化,农村社会风气越来越急躁、物欲和功利,金钱逐渐成为支配一切的准则(长子中,2010;周潇,2011)。在访谈中,大部分女孩,无论厂妹还是失足女,都不断谈起金钱,但是她们的收入往往花费在美容、化妆,很少给家里钱或给自己“充电”。进入信息社会,网络及各种媒体对她们的判断力影响很大,作为青年人,他们很容易接受新的思想和思潮,但是由于生活经历和文化水平的有限,她们缺乏明辨是非的能力,与原来传统的农村观念相比,她们更可能走向另外一个极端,由保守转向开放,也包括性开放。

## 五、结论及建议

我们通过对打工妹和失足女的文化目标和制度化手段的比较,可以看出失足女的失足原因:在打工妹与失足女的目标中,尽管有相同的地方,但是失足女的目标往往不符合现实,这些失足女大多没有接受好的教育,缺乏人力资本,而缺乏核心竞争力的中国制造业只能依靠提高劳动强度和劳动时间赚取利润,加之歧视等原因,工人尤其是打工妹的收入往往很有限,导致缺乏吃苦耐劳精神的女孩会越来越多地逃离工厂,逐渐脱离厂妹的角色,进入服务业,服务员的职业生涯进一步刺激了她们的城市梦想,她们更加渴望融入城市,但是上升的正常制度化空间被压缩,只能奢求通过婚姻改变自己的农村身份,但往往很难如愿;起支持和监督作用的乡土社会网络不断流失,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加上家庭环境和社会不良思想的影响,她们很可能把失足作为谋生手段,其中城市社会网络则对她们失足起到了一个催化作用。这也可以看到,我们在高速城市化和发展经济的同时,把农村人口吸引到城市,但是相关的配套保障机制并没有跟进和提高,这其中包括教育、就业、社会支持等方面,女性承受着二元社会制度和社会性别制度双重制度分割,过窄的正常制度化上升空间、社会不良思想及社会网络、缺乏核心竞争力的制造业、家庭及个人的人力资本及吃苦耐劳精神等都充当了女性就业的筛选机制,使一部分打工妹沦为失足女。因此尽管贫困不是失足的根本原因,社会支持乃至制度支持缺失是不容忽视的。

应该增强农民工在城市的制度支持,促进社会融合。中国的制造业涉及的问题极多,包括核心技术、管理、工人工资福利待遇等,城市也面临着户籍、失业、住房、教育等问题。新生代农民工希望融入城市,迫使科学提升企业技术及管理和城市社会对他们的接纳。改革的关键是要“努力让劳动者体面劳动全面发展”,实现地位平等、福利和权利一致,解决失业、住房、教育、养老等生存发展问题,增加农民工在城市的制度支持,让农民工在城市扎根,是真正的好的社会环境,这些制度推行时候要有社会性别视角,多倾向于处于弱势群体的女性,才能根除失足这种现象。

应该采取打击与教育相结合,多方支持,塑造正气和正确的价值观。失足女会对其他年轻人带

来不良影响,进而影响社会风气,因此公安机关要加大扫黄打非的工作力度,纯洁社会风气。对失足女严厉打击的同时,还要对进城务工的女性加强教育,人生目标的实现固然需要社会发展和支持,但最终还是取决于自身的艰苦奋斗以及对责任的担当。新生代农民工的权益要求和人生规划远远超过其父辈,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但是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福利水平还远未达到人们的期望,因此社会发展需要持续的努力奋斗。家庭和学校的责任亦重大,应当改变重男轻女的风俗观念,提高打工妹的教育水平和文化素养,教育青少年选择正确的人生道路。

### 参考文献:

- “两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调研组,2010,《“两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调研总报告》。参见《新浪》(<http://down.tech.sina.com.cn/content/49003.htm>)。
- 陈红霞,2003,《问题妇女越轨行为的原因及其防治对策》,《社会》第9期。
- 单光甯,1995,《中国娼妓——过去和现在》,法律出版社。
- 何明洁,2008,《工作:自我转换的平台——服务业青年女性农民工日常工作研究》,《青年研究》第2期。
- 胡枫、李善同,2009,《父母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儿童教育的影响》,《管理世界》第2期。
- 胡宏伟、童玉林、曹杨,2012,《受教育水平对新生代农民工收支均衡的影响》,《经济经纬》第1期。
- 黄盈盈、潘绥铭,2003,《中国东北地区劳动力市场中的女性工作者》,《社会学研究》第3期。
- 李娟,2011,《小城镇女性农民工性服务研究——以L市Y区为例》,《妇女研究论丛》第1期。
- 李培林,1996,《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社会学研究》第4期。
- 李培林、田丰,2012,《中国农民工社会融入的代际比较》,《社会》第5期。
- 李实、杨修娜,2011,《农民工工资的性别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第5期。
- 苗翠环、李龙海,2008,《做“二奶”的婚姻观:现代中国转型期女性价值观的迷失》,《重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9期。
-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编,2004,《中国农村研究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 潘绥铭,1999,《存在与荒谬》,群言出版社。
- 乔纳森·H.特纳,2006,《社会学理论的结构》,华夏出版社。
- 孙立平,2004,《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清华大学出版社。
- 孙秀娟,2007,《农民工上向社会流动空间分析》,《人口学刊》第4期。
- 唐筱蓉,1999,《卖淫女心理调查》,《公安与司法研究》第2期。
- 王鸿利、翟玉娟,2011,《深圳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报告》,汤庭芬主编,《深圳蓝皮书:深圳劳动关系发展报告(201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王华,2012,《“身体政治”与女性农民工》,《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
- 王惠,2009,《卖淫女行为轨迹的心理动力学剖析》,《武汉公安干部学院学报》第4期。
- 王金玲,1994,《世俗化:近十几年来中国人性观念的一种转型》,《浙江学刊》第5期。
- 王美艳,2003,《转轨时期的工资差异:歧视的计量分析》,《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5期。
- 谢泽源、谢梅林,2004,《教与学的贫困:贫困地区农村初中生辍学的根本原因》,《基础教育研究》第10期。
- 新生代农民工基本情况研究课题组,2011,《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结构和特点》,《数据》第4期。
- 徐丙奎,2007,《进城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与人际传播》,《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
- 许淑芬,2009,《女性农民工权益保障的制度缺失与对策研究》,《西安财经学院学报》第6期。
- 张明水,2011,《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初中生非经济因素辍学浅析》,《经济研究导刊》第5期。
- 张晓红,2007,《融入与隔离:从打工妹到卖淫女的角色转变》,《青年研究》第1期。
- 长子中,2010,《当前要重视农村社会关系领域发生的变化》,《北方经济》第17期。
- 周春艳,2005,《从农村初中的教育现状看农村初中生辍学现象》,《当代教育论坛》第20期。
- 周潇,2011,《农村青少年辍学现象再思考:农民流动的视角》,《青年研究》第6期。
- 朱虹,2004,《打工妹的城市社会化——一项关于农民工城市适应的经验研究》,《南京大学学报》第6期。
- ,2008,《身体资本与打工妹的城市适应》,《社会》第6期。
- Amuedo - Dorantes, Catalina and Pozo, Susan. 2006.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mittances and the Education of Children: The Dominican Case*, Working paper,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Western Michigan University.
- Bamgbose, O. 2002. *Teenage prostitution and the future of the female adolescent in Niger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ffend-

- er Therapy and Comparative Criminology, 46 (5).
- Brunovskis, A. , & Tyldum, G. 2004. *Crossing borders: An empirical study of transnational prostitution and trafficking in human beings*. Fafo Institute for Appli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 Brunschot, E. G. V. , & Brannigan, G. 2002. *Childhood maltreatment and subsequent conduct disorders: The case of female street prostitu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w and Psychiatry, 25(3).
- Bullough, B. , & Bullough, V. 1996. *Female prostitution: Current research and changing interpretations*. Annual Review of Sex Research, 7(1).
- Dalla, R. L. 2001. *A qualitative analysis of streetwalking: Prostitutes' interpersonal support networks*.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22(8).
- Dalla, R. L. 2006. *Exposing the "pretty women" myth: A qualitative investigation of streetlevel prostituted women*.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 Delacoste, F. , & Alexander, P. 1998. *Sex work: Writings by women in the sex industry*. San Francisco, CA: Cleis Press.
- Enright M. J. , Scott E. , Chang Ka - mun, 2005, *Regional Powerhouse: The Greater Pearl River Delta and the Rise of China*, John Wiley Sons (Asia) Inc.
- Evans, H. 1997. *Women and sexuality in China: Female sexuality and gender since 1949*. New York, NY: Continuum.
- Franceschini, I. 2008. *Concentrarsi sulla sopravvivenza. La prostituzione in Cina in un' intervista a Zhao Tielin ( Concentrating on survival. The prostitution in China in an interview to Zhao Tielin)*. DEP, 9.
- Jesson, J. 1993. *Understanding adolescent female prostitution: A literature review*.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 23(5).
- Kandel, William and Kao, Grace. 2001. *The Impact of Temporary Labor Migration on Mexican Children's Educational Aspirations and Performanc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35 (4).
- Liu M. 2012. *Chinese Migrant Women in the Sex Industry: Exploring Their Paths to Prostitution*. Feminist Criminology published online 4 July.
- Meng ,X. 1998. *Occupational Segregation and Its Impact on the Wage Differential among Rural - urban Migrant: A Chinese Case Study*. Applied Economics, 30 (6).
- Potterate, J. J. , Rothernberg, R. B. , Muth, S. Q. , Darrow, W. W. , & Phillips - Plummer, P. 1998. *Pathways to prostitution: The chronology of sexual and drug abuse milestones*. The Journal of Sex Research, 35(4).
- Pun,Ngai, 2005, *Made in China: Women Factory Workers in a Global Workplace*. Durham, London, Hong Kong: Duke University Press and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Sharpe, K. 1998. *Red light, blue light: Prostitutes, punters and the police*. Farnham, Surrey, UK: Ashgate.
- Yang Xiushi and Xia Guomei. 2006. *Gender, Migration, Risky Sex, and HIV Infection in China*. Studies in Family Planning, 37 (4).
- Zhao , Y. H. 2003. *The Role of Migrant Networks in Labor Migration: The Case of China*. Contemporary Economic Policy, 21(4).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学学院  
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责任编辑:孟蕾